

法國大革命史
上

克魯泡特金著

劉鏡園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

第一章 革命的兩大潮流

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從前的暴動——中等階級與人民聯合的必要——人民作用的重要。

兩個大潮流準備了和造成了法國的大革命。其一，思想的潮流——關於改造國家政治組織的新理想——發源於資產階級。其二，行動的潮流——農民和城市的工人要求馬上實際的改良物質生活——發源於民衆。這兩個潮流匯合起來；爲實現暫時的共同目的而在一個時期同盟互助，結果就是革命。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已經有很久的時候，攻擊當時政治組織基礎，他們認爲這種基礎上面的政權

以及大部分的財富都是屬於貴族和教士，民衆祇是統治者的牛馬。哲學家當時之宣告理智爲至高無上，勸人信仰人的天性（牠固然爲歷史上陷人做奴隸的制度所敗壞，但是人類一重返自由，牠是會復原的）的學說，實爲人類開放了新的紀元。他們宣告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無門第之分；一切公民——不管是皇帝或農民——都當服從法律；法律應由人民的代議機關製定，以代表全國國民的意志；契約應當自由，封建的奴役應當廢止；在這些要求之間更有一種爲法國人民思想特色的系統精神和方法爲之連繫。當這些哲學家提出這些要求的時候，他們無疑的是準備了舊政體的傾覆（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

然而，單是這個還不能引起革命的爆發。牠必須從理論進於行動，從認識一個理想進到事實上使其實現；今日的歷史家所最應當研究的，即是那時候的環境是怎樣情形，何以在某一時候使法國能實現這種理想。

另一方面，在一七八九年前好久，法國就走進了一暴動的時期，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四的登基是一大堆飢民騷動的開端。這些騷動延長至於一七八三年。以後有一個時期，比較的平靜。但是在一七八六年以後，農民的暴動是更其猛烈的爆發。災荒是頭一堆騷動的主要原因。現在，一七八六年以後，固然麵包缺乏永久是暴動的主要原因，但是重最要的還是農民不願意再交付封建的賦稅，

逼着他們不得不叛亂。直到一七八九年，騷動的次數是不斷的增加，在一七八九年這一年，他們在法國的東部、東北部和東南部特別的普遍。

社會有機體是這樣的分崩離析。然而一個農民暴動還不是一個革命，無論他們的氣勢是如何的兇猛，如像一七七三年俄國的農民在布喀喬夫的旗幟之下。一個革命並不等於城市和鄉村的一堆暴動的總和。他的意義要無限的大些。無論政黨間怎樣鬥爭，甚至於引起流血，無論街市上如何巷戰；無論政府是如何不斷的更換（如像一八三十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情形），僅僅這些，不能算是革命。革命的意義，比這些都要大些。一個革命的意義，是在幾年之內，迅速的掃蕩那些已經在地上生了根幾千百年的制度，這種制度在表面上是很安定而不可動搖，甚至於最熱心的改革家也不敢在文字上攻擊他。革命的意義，是使自古以來構成一國社會，宗教，政治，經濟的生活之實質，在幾年之內傾覆和崩潰；根本改變人們對於社會複雜制度的因襲的思想和流俗的成見。

最後，許多嶄新思想也由革命誕生，許多關於公民間關係的平等思想；很快的變成現實，傳播到鄰近各國，震動了全世界，把牠的標語，牠的問題，牠的科學，牠的經濟政治和道德的發展路線都傳給了下一世紀的人類。

爲了獲得這樣重要的結果，爲了這運動能成爲一個革命，如像英國的一六四八年至一六八八年

和法國的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光是智識階級中間的思想的運動，無論他如何淵博，是不夠的；光是人民的騷動，無論牠如何頻繁而且擴大，也是不夠的。必須人民方面的革命行動和智識階級方面的革命思想能夠符合，必須這兩個運動能聯合起來。

由此，法國的革命，完全和前一世紀的革命一樣，發生在資產階級受了當時哲學的薰陶，感覺要恢復他們的權利的時候，他們想出一種新的政治組織方案，而且自負其有智識，努力的使其實現。他們感覺自己是很能從宮庭的貴族手中奪去政權，他們認定這些貴族之無能奢侈和放蕩只能引導國家走到完全的滅亡。但是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單靠自己是一點也不能作什麼，幸虧由於種種環境的關係，農民羣衆的暴動繼續四年之久，使資產階級中失意的分子，能和國王和宮庭鬥爭，推翻舊的制度，完全改變王國的政治組織。

然而這兩種運動的歷史尙有待於著作。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從各黨各派的觀點上，已經作過而又重新作過，不知有幾多次數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歷史家所專門敘述的是政治史紀載，資產階級如何戰勝皇黨和戰勝舊的帝制制度的擁護者。我們也很清楚革命以前的思想史。我們也知道支配革命的一些原則和牠在立法上的體現；我們曾經十分的醉心於那些出現在世界上的偉大思想，正是十九世紀的文明國家極力求其實現的。一言以蔽之，大革命時代的議會史，戰爭史，政治史和外交史

已經有人極詳細的研究和敘述過。但是大革命的民衆運動史還付缺如。鄉村和城市的人。在這革命中的作用是從不完全的爲人研究過和敘述過。造成革命的兩潮流中的思想潮流是知道的，但是，另一潮流，民衆運動的潮流，甚至於簡單的記載也沒有。

我們是現代人所稱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後裔，我們應當研究民衆的潮流，至少將他的主要的內容弄清楚。



第二章 思想

近代國家——英美革命對法國革命之影響——資產階級的狀況與目的——權力集中——對農民的態度——十八世紀哲學家之影響。

爲要更好的了解那感動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我們應當依照牠的結果——近代的國家組織——評判牠。

我們在今日所看見的這種國家組織，在十八世紀末年僅粗具模型。現在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在那個時候還未達到如我們今日所見的完成或均一的形態。近代的國家組織得可怕的嚴密，從一個首都發出命令，即可以動員全國的人民，準備戰爭，被運送去前線殺戮別國人民，而家中則兒號母泣；在一國的領土之上，滿佈着官僚機關的網，各人的個性都在這機關中完全消失而爲官僚的奴性所代替，機械的服從自中央發出的命令；我們今日到處看見的公民對於法律無條件的服從和對於法律，國會，司法官和他們的代理人之崇拜；那種從上至下秩序井然，組織和訓練好了的職員；那種

由國家供給和指導的學校系統，教人崇拜權力和教人服從；那種產業制度，將工人壓在車輪之下，國家坐視不問；那種商業，將巨量的財富集中在那些獨佔土地礦山交通和天富的人們之手，並且由他們養贍着國家；最後，那種科學，完全解放了人的思想和無限制的增加了人民的生產力，而同時使這些生產力隸屬於強者和其國家之手——這一切都是在革命以前不存在的。

然而在革命尚未發出吼聲，表示牠快來之前，法國的資產階級——第三階級——已經很久預見到一種準備建築在封建王國的廢址之上的政治制度。非常可信的，英國的革命幫助了法國資產階級理解了管理社會時他們的作用。美國的革命一定也刺激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者的能力。謝謝霍布斯，休謨，孟德斯鳩，盧梭，福祿特耳，馬布里，達享孫和別的人的鼓吹，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大家都很喜歡研究代議制的政治組織問題，此外塔哥 Turgot 和亞當斯密對於經濟問題和政治組織中財產作用問題的研究，亦受人注意。

由此，在革命爆發以前好久，土地工廠所有者，或自由職業者統治着國家，實行中央集權和將國家組織得很有秩序，這一類的思想已經在許多的書籍和小冊子中討論，以後在革命時代行動的人都是受此等書籍的影響，從這些地方獲得他們的精神教育和智力。

由此，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在走入革命時代的時候，很清楚的知道他們要什麼。他們自

然不是共和主義者——難道他們現在也是共和主義者麼？但是他們再不願意國王有獨斷的權力，他們拒絕受親王和宮庭的統治，他們不承認貴族祇奪取政府中最好的位置，而不知治理國家，他們不願讓貴族掠奪得鉅量的財產，而不知使其變為價值。資產階級在感情上是共和主義者，喜歡新起的美國共和國那裏的共和主義者的簡單的習慣；但是他們最要求的是有產階級的政府。

他們傾向於思想自由，却不是無神主義者。他們並不憎惡天主教。他們所最憎惡的是教堂以及牠的各層等級的主教，牧師等人，這些人都和親王一致，是貴族的恭順的工具。

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明瞭當時的法國是和一百四十年以前的英國一樣，到了第三階級從王室手中取得政權的時候了，他們知道他們應該怎樣使用這政權。

他們的理想是在得到一個憲法以英國憲法為模範，把國王的位置變成一種記錄的書記，有時在兩不相下時可以有決定的投票權，但是主要的還是作為國家的統一的象徵。至於真正的權力則授予國會，在國會中應由有知識的資產階級（即代表國內活動的和有思想的人民）佔優勢。

同時，他們的理想是要廢除一切國內許多自治單位的地方權力。他們要集中一切政權於一個中央執行機關的手中，受國會的嚴重監督，國內人民亦應嚴重的服從這個政府。國家結合各部的事務——賦稅，司法，警察，軍隊，學校，民政，和工商業的一般管理——集中一切。同時他們想宣告

商業的完全自由，和允許工業的企業家能自由開發一切富源，自由剝削勞動者，和勞動者此後可以毫無保障的讓僱傭他的人任意剝削。

一切都須在國家的嚴格管理之下，以便幫助各人的致富和大資財的積疊，這是資產階級認為十分重要的，特別是當召集三級會議 *Etats — Généraux*（按即國會別名，即當時的三個等級：貴族，教士，及第三階級推舉代表組織成的聯席會——譯者）以防止國家財政破產的時候。

第三階級人物的經濟思想也是同樣的精確明瞭。法國的資產階級曾經讀過塔哥，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創造者——的著作。他們知道這些理論已經應用於英國，他們嫉忌海峽對岸鄰居國家資產階級的強有力的經濟組織和他們的政治權力。他們夢想資產階級（大的小的）能佔有土地和開發牠的富源，這些土地在貴族和教士之手，徒然是不生產的。在這方面，他們得到住在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做同盟，在那時候，小資產階級已經是一種力量，在革命以後，這種力量因數目之增加而更增加。他們已經預見到工業和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之迅速發展；他們預見到和遠地的國外貿易，輸出製造品到海外；他們已預見到東方的市場，大規模的企業和巨大的財富。

他們懂得，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須預先打破鄉村對農民的束縛；必須農民能自由離開他的茅舍，或者須強迫他離開，以便驅使他到城市中去找尋工作，這樣在換了主人以後，他能替資本家生

產黃金，不至於再替地主生產地租，生產地租一方面是壓迫他很厲害，但是對於主人也不十分賺錢。最後，他們要整頓國家的財政，要使捐稅更簡單化和更生產。

總之，他們所要求的即是經濟學家所稱爲工業與商業的自由，其真正意義，即是一方面免除工業受國家的繁重和苛酷的監視，另一方面，給他們以剝削工人的完全自由。他們再不要行會，也不要手工業協會；既不要職業的監視，也不要手工業的老板，不要那一切足以妨礙剝削工銀勞動的東西；不要妨害製造業發展的國家監督，不要妨害本地工業的釐金，不要禁止輸入的條例。對於僱主業務，則完全的任其自由，對於工人，則嚴厲的禁止任何團結。對於一方面，採取放任政策；對於另一方面，完全禁止他們的團結。

這就是資產階級所抱的兩重計畫。在機會到了的時候，他利用他的充足的學識，清晰的見解和業務的習慣，對於此計畫之整個或其一部都沒有躊躇，直接的把他定成法律。他們之這樣做，是很一貫和明敏，但是民衆却沒有這種能力，因爲他們預先沒有想出一種理想可以與第三階級先生們的理想抗衡。

自然，我們若說資產階級祇是受了純然的自私動機所驅使，這未免是不公平。假使這是如此，資產階級事業即永遠不能成就。大的變革總需要一種理想爲成功的必要條件。第三階級最好的代表，

曾十分醉心於高尚的十八世紀的哲學，即以後來一切偉大思想的來源。這種哲學之顯著的科學精神；他的極深厚的道德性格（甚至於在嘲笑因襲的道德時，仍是道德爲懷）；他祇相信處在平等的人民中間的自由人的智慧，力量，和偉大；他仇視專制制度——這些都是當時革命者的精神。他們在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堅毅和忠誠，假使不是受哲學的影響，如何能得到呢？我們須承認，甚至那些努力實現中產階級致富的政綱的人，也有一些人認真的相信，個人的致富是使全國富足的最好方法。不是有一些最好的經濟學家，由亞當斯密爲首，認真的宣傳這種見解嗎？

無論這種自由，平等，和自由進步的抽象觀念是如何的高尚，感動了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的資產階級中間的誠實的人，但是我們是拿他們的實際政綱和他們理論的應用來評判他們。這些抽象的觀念在實際生活中變成一種甚麼東西呢？祇有這才是我們測量的真標準。

假使我們承認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是受了自由，平等（在法律之前平等），和政治與宗教的解放等觀念的影響，這些觀念在其具體實現的時候，正是向着我們以上所指的兩個路線上發展：即自由開發利源，以使個人致富；自由剝削勞動力，使被剝削者毫無保障，以及組織一種政權，保障資產階級得自由行使其剝削。我們很快的看見，革命黨中有一派想超過這一政綱的時候，他們即在一七九三年掀動了可怕的爭鬥。

第三章 行動

人民——大革命與社會主義——土地使用權平等——「共產主義」——人民對形勢之不明瞭——貧民對貴族及教士之怨恨——怨恨封建主義——人民之準備拿起武器。

但是人民是怎樣呢？他們的思想是怎樣呢？

人民相當的感染着流行的哲學的影響。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經過萬孔千穴流入鄉村和大城市的工人區域。尊敬王室和貴族的心理是早消滅了。平等的思想浸入在最下層的民衆中間。叛亂的光線射入許多人的精神裏。不久會發生變化的希望，是在最貧苦人民的心中跳躍。『我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但是一定要出一點事情，讓他快點發生呵！』在革命的前夕，亞德陽在法國旅行的時候，他聽見一個老嫗如此說。所謂『一點事情』是指着能緩和人民貧困的事情。

有人最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前的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自身，是否含有社會主義的成分。『社會主義』的名詞，當時自然是沒有，因為牠祇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才發生。今日社會黨

中之社會民主派把社會主義的意義認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那時顯然不是如今日之盛行，因爲社會民主黨的集產主義創始者維達爾 Vidal 和拍克 Pecqueur 祇是在一八零四年和一八四九年才發表其著作。但是我們在今日閱讀大革命以前的著作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感覺到這些著作是充滿那些成爲近代社會主義實質的思想。

兩種基本思想——一切公民應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權，以及我們今日所稱爲的共產主義——都在當時的百科全書派中一部分作者和其他著名的著作家中找得出忠誠的信徒，如馬布利，達享蓀和他較不重要的人。當時大工業還在雛形時代，工廠過少，祇有土地是剝削人類勞動力的主要資本，所以那時的哲學家和十八世紀革命者的思想自然都傾向於土地共有。馬布利是比盧梭影響當時的革命者爲更深的一人，他不是在一七六八年，在他的『對於自然界的秩序和對於社會的要素的懷疑』的著作中說過土地使用權平等和土地應當共有嗎？而一切土地和富源——森林，河道，瀑布——之國民公有，這不是支配着大革命以前的著作和大革命期間的民衆革命者左翼的思想嗎？

不幸，那些力爭人民幸福的人，對於共產主義祇是一種期望，沒有明白而具體的概念。在有產的知識階級方面，解放的思想成了一種改造政治經濟組織的綱領，在民衆方面，他祇是一種模糊的願望。他常常祇是一些否定。那些向人民宣傳的人們不想確切的指出民衆的要求或他們的否定在什

麼具體形式之下，才能實現。他們或者力求避免說得很具體。無論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他們似乎向自己說『向着人民談以後怎樣改造的方案，這有什麼用呢？這祇有寒他們的革命之胆。我們所需要的，只是進攻的力量以破壞舊的制度。至於將來怎樣，將來自有解決的辦法的』。

現在不是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同樣的想法嗎？因為他們急忙的加速叛亂的到來，遂致將那些提出革命的任務和研究革命成功以後當做些什麼的人，都認為是空談的理論家。我們也可以說，著作者——多半是城裏人和書生——之無知識是此種現象的很大原因。比方，國民會議中，有知識有經驗的人才——律師，新聞記者，商人等等——中間祇有兩三個研究了封建法律的法學者，他們中間祇有幾個農民代表，算是從個人的經驗熟悉鄉村的需要。

因為這些複雜原因，羣衆的思想祇是用幾個簡單的否定口號。『燒燬登記着封建賦稅的簿據呵！取消什一稅！取消國王的否決權！絞死貴族！』但是這已經解放了的國家應當歸誰來管理呢？誰是上斷頭台的貴族的繼承者呢？政權從皇室的手中落下來了，誰來掌握他呢？他在資產階級手裏，比在舊政體之下更是一個可畏的武器。

人民對於革命希望得到什麼，大都缺乏明瞭的觀念，這是反映在全部的運動中。當資產階級腳步堅定不移，斷然決然依照他們的理想改造國家政治組織的時候，人民正在那裏躊躇猶豫。尤其是

在城市裏，人民似乎最初即不知道奪得權力之後應當做什麼以發展自己的利益。及到以後土地法案和平均財產法案開始具體提出的時候，原來這些草案與許多財產觀念的成見抵觸，即最誠實擁護民衆利益的人們亦所不免。

關於國家的政治組織問題也發生了類似的衝突。這種衝突的主要點是當時民主主義者政府組織的成見和人民心中所醞釀的政治分權的觀念不能並容，人民願意自治機關，大城市的區和鄉議會，獲得極大的自治權力。爲了這一問題在將來的國民大會中發生許多流血的衝突。爲這一問題，大革命對於大多數的民衆，除了從普通的和教會的地主手中取得了一點土地和免除了封建的苛徵以外，在旁的地方是沒有什麼結果。

假使人民的思想在建設方面是模糊的，他們在他們的否定的要求中有幾點是極其明瞭。

第一，貧民怨恨一切游惰，腐化，乖離的貴族，這些人統治他們的結果使鄉村和大城市的黑暗巷子中貧民充斥。第二，對於教士的怨恨，因教士的同情心之所向，與其說他們是站在養活他們的人民方面，不如說他們是屬於貴族。第三，對於舊政體一切機關的痛恨，因爲他不以人類視貧民，使貧困更難忍受。他們怨恨封建的制度及其苛徵，使耕作者在農奴制度久已消亡之後，還奴役於地主。最後，農民的失望，他們在那些荒年中看見在地主手中的田地荒着不耕或者祇是貴族的娛樂